

『西北民族走廊』研究专辑

河湟

文化研究文丛

(第二辑)

HETAOMIN WENHUA YANJIU WENCONG

范卫平 主编

袁建勋 白宏刚 副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洮岷文化研究中心

洮岷

文化研究文丛（第二辑）

“西北民族走廊”研究专辑

范卫平 主编

袁建勋 白宏刚 副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洮岷文化研究文丛.第2辑 / 范卫平主编.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226-04628-9

I. ①河… II. ①范…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史—甘肃省—文集 IV. ①K29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97520 号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王建华

封面设计: 雷们起

河洮岷文化研究文丛.第二辑

范卫平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15 插页1 字数256千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 978-7-226-04628-9 定价: 32.00 元

总序

张俊宗*

地域文化因地理特点、人口构成、区域社会功能等因素的不同而异彩纷呈。河、洮、岷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是北方地区通往藏区的门户，这一地理特点，使得这一地区在生产方式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有机结合，在地理功能上成为北方连接西南地区的大通道。而从人口构成来看，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宋以前有原住居民羌、氐、吐蕃、党项和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吐谷浑、回纥等民族；蒙元以来，由于战争、商贸等原因，西域、中亚的大量人口落户这里，民族种类剧增，在狭小的区域内达到 20 多个民族；而历代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经略，又使大量中原人口移居此地，成为这一区域人口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中央王朝十分看重这一地区的战略价值，先后设立过河州、洮州、岷州等地方政府机构，虽然这些机构的治所和辖境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但其政治功能却始终未变，它成为中央政府联系这一地区民族成员的纽带，因此，它也具有了一些与其他地方政府不同的职能和运行特点。上述地理的、人口的、区域社会功能的特点，孕育了这一地区独有的文化，这一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多元文化互动共生：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互动共生；藏、羌、回、汉等多民族习俗互动共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互动共生；本地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区域文化互动共生。多元文化的互动共生，不仅成就了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形成了多种文化因素融合涵化的文化生态。

独特的文化潜藏着独特的价值，记忆着过去，昭示着未来。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如何和谐相处？各民族通过怎样的机制相互借鉴吸收彼此的优秀文化？各民族又是怎样在融合涵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在维护国家统一、形成区域内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中，历代中

中央政府积累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互动共生的文化生态如何形成？这些对当今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存在于这一区域过往的历史演进之中，存在于依旧鲜活地跃动在这块大地上的人们的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洮岷文化是研究人类文化互动共生的活化石。研究河洮岷互动共生的文化模式，意义重大而深远！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地处河洮岷腹地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市，这为学院开展河洮岷文化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建校以来，河洮岷文化研究一直是学院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河洮岷文化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院教师承担与河洮岷文化研究相关的课题 55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1 项，甘肃省教育厅项目 29 项，甘肃民族师范学院院长基金项目 22 项；出版与河洮岷文化研究相关的专著 8 部、教材 2 部；累计发表河洮岷文化研究论文 230 余篇，其中有 80 余篇发表在《中国藏学》《世界宗教研究》《文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等国家权威或核心期刊上。这些成果的取得，为今后全面、系统地开展河洮岷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2008 年学校“升本”以后，学校提出把学院建成服务区域人才培养的基地、科学研究的平台、文化建设的窗口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阵地的办学目标，在原有系、部和科研机构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整合院内外力量，优化学术队伍配置，强化已有学科优势和开拓新的专业生长点，加快学术事业的发展，尽快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学院成立了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安多藏文化研究中心、民族教育研究所、高寒生态系统研究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等 5 个研究机构。2012 年，学院为进一步凸显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办学目标，根据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立州、旅游兴州、文化撑州、产业富州、稳定安州”的五大战略目标，正在有步骤地推进地校联合，跨区域合作，共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可以预见，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多样、更加富有成效的河洮岷文化研究局面将逐步形成，一个富有特色、富有价值、充满活力的新的地方文化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确立！

目前，河洮岷文化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为了给河洮岷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稳定的学术平台和有效的交流窗口，为了使院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及时传播和交流，学校决定编辑出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河洮岷文化研究丛书”，在“十二五”完成 10—15 部左右的专著和教材；与此相应，

学校还决定编辑出版“河洮岷文化研究文丛”，将这一领域已有或正在进行的相关研究成果汇编成册，每年出版一集。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有效地促进和带动河洮岷文化研究，也为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好步、开好头，使河洮岷文化这朵奇葩更好地盛开在地域文化研究的百花园中！

2012 年 11 月于合作

* 张俊宗,教授,博士,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著有《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回应》等。

前 言

本书选编有关“民族走廊”的研究文章 18 篇，共分三组。第一组 8 篇，除第一篇是辑录费孝通先生论述“民族走廊”的文字外，其余 7 篇是关于“民族走廊”学说的研究文章。第二组 5 篇，是论述“西北民族走廊”的文章。第三组 5 篇，除《汉藏走廊的羌族》一文，都是受费老“民族走廊”的理论启发，对“西北民族走廊”的新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选编“西北民族走廊研究专辑”？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2008 年 7 月，我校“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但是，河洮岷研究“做什么”和“怎么做”，其实大家并不清楚。以往的研究，也只是选取河洮岷文化的某个点，写篇文章，评个职称，完成科研任务，不会考虑到河洮岷研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问题。但是，成立了研究机构，这个问题就需要认真思考。

1993 年 8 月，当时还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社科系任职的朱炳祥先生来甘南考察，他鼓励我做地方文化研究。他说，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南北文化、东西文化、汉藏文化的交汇地，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当时，我虽然心向往之，但因自己从事先秦文学教学和研究，无暇顾及地方文化，只是平时喜欢搜集有关资料而已。2009 年 8 月，我调入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这才思考河洮岷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和价值问题。

当我系统梳理了费老有关“民族走廊”的论述，阅读了有关学者的论文和著作，我对河洮岷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河湟洮岷地区，也可称为“河湟洮岷民族走廊”，它是以古河州、洮州、岷州为中心，连接和辐射周边诸多区域的多民族杂聚地带，扩大点说，就是费老称为“陇西走廊”的地区。“陇西走廊”，据有关学者的观点，它北起祁连山脉分支乌鞘岭，往南延伸到横断山区，连接着河西走廊和“藏彝走廊”，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大致包括甘肃省的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

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洮县、渭源县、漳县、岷县、宕昌县、陇南市、文县以及青海省的西宁市、大通县、湟源县、湟中县、民和县、乐都县、互助县、平安县、化隆县、循化县、同仁县、尖扎县、贵德县等地^[1]。

河湟洮岷民族走廊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藏、汉、回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互动共生、融合涵化、层累积淀的地区。这里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中华民族重要的交融地,也是多种文化的沉积带。

在费老的论述中,“陇西走廊”(河湟洮岷民族走廊)和河西走廊构成“西北民族走廊”。但是,相对于“藏彝走廊”而言,“西北民族走廊”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藏彝走廊”民族多被大山、大河所割裂,族群相对比较独立,族性特征鲜明且保存相对完好,所以,“藏彝走廊”研究侧重于族群族性研究;而“西北民族走廊”的民族,虽然也保持着各自的民族特性,但民族之间的互动性很强。第二,“藏彝走廊”虽然族群众多,但以农业文明形态为主;而“西北民族走廊”,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两大文明形态碰撞、交流、共生、发展的地带。历史地看,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碰撞、交流、共生、发展,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蒙元以降,“西北民族走廊”以回族为主的伊斯兰民族,通过商贸活动,沟通、联结着这两大文明形态的人群,为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交流、共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说,“西北民族走廊”的特点是多元文化互动共生。

如果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原来侧重汉族社区研究,那么,从费老提出“民族走廊”学说之后,“藏彝走廊”族群族性研究为其开辟了新天地。我想,随着“西北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共生研究的深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将形成三大学术追求和特色板块,即传统汉族社区研究、“藏彝走廊”族群族性研究、“西北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共生研究。由此言之,河洮岷文化研究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费老提出“民族走廊”学说之后,西南学者率先强烈响应^[2],“藏彝走廊”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热点。相对而言,“西北民族走

廊”研究显得迟滞。最近几年,才有学者(马宁、秦永章、陈庆英等)撰文阐释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范围、特点等问题。2011年11月,中央民族大学组织召开了首届“西北民族走廊的文明、宗教与族群关系研讨会”。

当然,“西北民族走廊”的民族、宗教、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的研究,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也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譬如杨建新等对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陈庆英对藏族部落制度的研究,洲塔、丹曲等对甘肃藏族史和部落制度的研究,蒲文成等对汉藏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陈光国等对青海藏族史的研究,谢佐对青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贾霄锋对藏区土司制度的研究,郝苏民等对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的研究,何琼对西部民族文化的研究,苏发祥等对安多藏族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秦永章对甘宁青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的研究,祝启源、齐德舜对唃廝囉政权的研究,谢热对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研究,武沐对河湟洮岷历史文化的研究,尕藏加的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研究,南文渊、何峰的藏族生态文化研究,杨士宏的安多东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丁宏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马自祥、陈其斌等的东乡族研究,马世仁、马少青等的保安族研究,马明良、赵春晖、马成俊等的撒拉族研究,鄂崇荣、李克郁、祁进玉等的土族研究,李璘、张润平、包孝祖、季绪才等岷州地方学者对岷州文化的研究,王沛、陈元龙、王魁等河州地方学者对河州文化的研究,李振翼、宁文焕、马廷义、范学勇、马永寿等洮州地方学者对洮州文化的研究,范长风、阙岳、王淑英对洮岷地区庙会的人类学研究,赵宗福、柯杨、郭正清、武文对河湟洮岷花儿和民俗文化的研究,霍福、唐仲山、梁莉莉、苏延寿、张海运、闵文义、韦仁忠、关丙胜、鄂崇荣、才仁措对藏汉民族杂居村落民俗文化互动、变迁、融合的研究,还有我校陶柯、杨文、阿旺加措、陈武强、杨士钰、敏贤麟、喜富裕、毛光远、沙勇、宁文忠、王晓云、高君智、后宏伟、李卫平、李虹、卓玛措等学者的研究,等等。

但是,从“民族走廊”的视角,以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为基础,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西北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共生的文化生态及其深层结构,是有待努力的研究方向。我们选编本书,期望能够推进“西北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共生研究。

在选编本书时,发现有些论文的讹误之处,在此指出,请读者注意。

1.李星星先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文化

论坛》2005年第3期)和《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陵走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中,将费先生第二次和第三次讲话的时间弄错了。这种错误不只是颠倒了时间,更主要的是导致了李先生对费老“民族走廊”学说形成过程的误释,所以,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其实,费老的第二次讲话是1981年12月7日,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费老首次提出“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的术语和“六板块”说,即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但没有提出“西北走廊”的概念。该发言稿后经整理,以《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为题,发表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上。费老的第三次讲话时间是1982年5月27日晚,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这次讲话中,费老系统地讲了“三大走廊”,并首次提出“西北走廊”的概念。该发言稿后经整理,以《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为题,发表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上。

2.李先生《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陵走廊”》一文中,仅以费先生1978年至1982年的三次讲话为据,就断言:“正式采用民族走廊这个术语,并把它确定为一个民族学概念,而且首次为民族走廊概念作出定义,这是李绍明先生做出的学术贡献。”认为“费先生提出了走廊以及三条具体的走廊,即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而自始至终没有提到民族走廊这一术语。”又,《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中说:“李绍明先生的‘民族走廊’定义是对费先生提出的‘走廊’概念最先作出的规范化处理。”“‘民族走廊’是李绍明先生按照费先生的观点首先规范的一个特定概念。”

其实,早在李绍明先生《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此文原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中首次对“民族走廊”下定义之前,费老在1983年6月30日为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写的《序》中就明确提到“民族走廊”这个词语:“我在支持西南六江流域的民族调查时曾说过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可能是另一个地区的综合调查的开始。这个地区就是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其后,费老在一系列重要文章中都谈到“民族走廊”这个词语,如《甘南行》(《瞭望周刊》1986年第2期)、《临夏行》(《瞭望周刊》1987年第23期)、《社会学的历史使命》(《社会》1987年第6

期)、《海东行》(《瞭望周刊》1988年第11期)、《发展商品经济 协调东西关系》(《改革》1989年第1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甘肃行杂写(之四):“两南”兴牧》(《瞭望周刊》1990年第12期)、《武陵行(上)》(《瞭望周刊》1992年第5期)等。

可惜,李先生没有阅读费老的其他文章,就骤下断语:“他毕竟没有提到民族走廊这个词语。”并认为“费先生在两个思考环节上的忽略……”不仅李星星先生,其他学者在论述“民族走廊”学说时,也多以费老的“三次讲话”为据,而不是比较全面地阅读了费老的文章,整体地理解了费老的“民族走廊”理论。更有甚者,直接采用李先生文章的相关内容,以讹传讹,连费老的文章都不读一下。当今学者治学之不严谨,于此可见!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指出上述讹误,并非否定学者们对“民族走廊”学说的探索贡献。

其实,费老的“民族走廊”理论,虽然主要是谈民族问题,但也谈到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现代化问题。费老的“民族走廊”学说,不仅仅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它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首先,它要求打破区域性、地域性的局限,“一盘棋”地研究民族问题。其次,它要求从民族自身的立场研究民族问题,要求研究者低位进入,以平行视角开展研究。其三,它要求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依循理论而不囿于理论,为学术而不唯于学术。费老思考问题之宏阔和关注社会现实之深切,能够引导我们超越仅仅从民族学角度研究“民族走廊”的思维阈限,而从“经济走廊”、“交通走廊”、“文化走廊”、“现代化走廊”等更为宏阔的视角研究“民族走廊”问题。

自从费老1978年9月提出“民族走廊”学说之后,三十多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特别是西南学者的不断探讨和努力,今年,终于由学术研究转化为政府决策。2014年3月3日,文化部和财政部印发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这将“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区域经济支柱性产业,保护文化生态,传承民族文化,增强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团结”^[3]。这是“民族走廊”学说为现代文化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对费老最好的告慰。

1985年8月,费老来到我们甘南,提出“陇西走廊”的概念,完善了

“西北走廊”的内涵。当时,正值我校筹建,教育部尚未批准,但他对“甘南师院的创建寄托厚望”,回京之后,即向时任教育部长何东昌建议,东昌部长即来甘南实地考察,促成了我校的创建^[4]。今年,是我校创建30周年,我们选编本书,纪念费老,庆祝校庆,也期望对《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的实施,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思考,真是意味深长、意义深远!

范卫平

2014年7月13日于甘南合作

注释:

[1]参见马宁《论“陇西走廊”的概念及其内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和秦永章《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参见李绍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总序》,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3]文化部、财政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前言》。

[4]在编写我校口述历史时,我访谈了原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合作师专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振业同志。1985年,费老来甘南时,是赵振业同志迎接、陪同、汇报工作。他说,1984年10月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下达《关于同意筹建合作民族师范专科学校的批复》,但为时已晚,国家教育部收回了高校审批权,省政府的批文已经不管用了。东昌部长实地考察甘南之后,打破常规,先行批准招生计划。批准建立我校是在学生上课一学期后的1985年年底到1986年年初。我校现在仍以省政府批准时间为建校时间。

目 录

费孝通论“民族走廊”	范卫平 辑录 (001)
再谈民族走廊	李绍明 (043)
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	李星星 (045)
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陵走廊”	李星星 (058)
构建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意义	李星星 (078)
论民族走廊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曹大明 (085)
论民族走廊的形成机理	葛政委 黄柏权 (093)
论民族走廊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葛政委 (102)
论“陇西走廊”的概念及其内涵	马 宁 (111)
费孝通与西北民族走廊	秦永章 (139)
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	秦永章 (150)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节选)	秦永章 (160)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	陈庆英 赵桐华 (167)
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研究	马 平 (174)
“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刍议	沙彦奋 (180)
语言走廊:河陇近代语言地理研究	李智君 (189)
汉藏走廊的羌族	[法]石泰安 著 耿昇 译 (206)
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	
——以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为例	徐黎丽 杨朝晖 (218)

费孝通论“民族走廊”

范卫平 辑录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

按：本篇辑录了费孝通先生有关民族走廊的论述，侧重于谈“西北走廊”的部分。从费老的论述和思考看，费老的“走廊理论”，虽然主要在谈民族问题，但也谈到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现代化问题。费老的思考不仅引导我们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研究民族走廊，而且将引导我们从“经济走廊”、“交通走廊”、“文化走廊”、“现代化走廊”的视角研究民族走廊。

辑录以文章发表或出版的先后时间为序，有些文章、讲话写作时间早，但发表时间迟，仍然将其排在后面。如：《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上的发言》时间是1993年3月22日，发表于《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为“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2003年11月6—8日）写的《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载于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文字校对以《费孝通全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全集》）为准，所以，个别地方与文章最初发表时有所不同。有些内容重复的文章没有辑录，主要有：《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第9卷）、《抓紧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第10卷）、《潘光旦先生关于畬族历史问题的设想》（第11卷）、《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第11卷）、《瑶山调查五十年》（第12卷）、《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第12卷）、《对民族工作的一点看法和意见》（第12卷）、《发挥民族优势 开拓民族经济》（第12卷）、《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第12卷）、《压力·时机·对策》（第13卷）、《访骆驼之乡》（第13卷）、《开发大西北》（第13卷）、《凉山行》（第13卷）、《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第13卷）、《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第14卷）、《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第15卷）、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第15卷)、《民族生存与发展》(第17卷),请读者查阅。在辑录过程中,发现有5篇文章尚未收入《全集》。

一、《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1]

在川甘边境,大熊猫的故乡周围,四川平武及甘肃文县境内居住着称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有几千人。新中国成立前受当地番官、土司、头人的奴役。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尔后,惨遭国民党的屠杀,仅存500余口,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和附近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原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访问该地,听该地区上层说,这部分少数民族也是藏人,因此暂定名为藏族。1964年,国庆15周年该族的尼苏同志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人代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大型彩色纪录片《光辉的节日》有她两个特写镜头。喜讯传遍了尼苏的故乡,欢欣鼓舞之余,对这个族名却发生了怀疑,因为从祖辈传下来的史事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州的藏族,又有别于茂汶的羌族。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

从这些事实上不难看出,“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呢?有些历史学者根据这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氏族的后裔。但是魏晋之后的史料就缺乏有关这地区氏族的记载,几百年的空白还不易填补。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瑜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氏、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但是就是在这些藏族聚居区里发现了许多“藏人”所说的语言和现代西藏的藏语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四川西北部的嘉绒藏语和现代

拉萨藏语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嘉绒地区向南，在这走廊中有迹象表明还存在着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这类语言在家庭等亲密的群体里还在使用。中央民族学院曾有一位教授，贡嘎活佛，他的家乡在康定木雅乡，今属沙德区，藏语称该地为 mmyak。这地方的人对外一般使用藏语，但在家里还讲一种和藏语不同的土话。这种土话至今未经语言学者深入研究。从这地方的藏语地名上看，值得注意的是它和藏语称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的名称相同，也就是《新唐书·党项传》所说的“弭药”，古音 mjeiak，而党项羌的发祥地有人认为就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金沙江与大金川之间。《新唐书》上有：“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新唐书》第221卷上）那是说，原来住在这地方的党项人一部分北迁后，留下的一部分受到了吐蕃的统治。现在还保持在这地区的那种“土话”是否和党项羌古语有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康定向东，在岷江上游是有如孤岛般存在着的，现在已被承认是单一民族的羌族。再向东在涪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就是有人要求重新审定族别的“平武藏人”。从康定向南往西，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还有一种过去和“平武藏人”一样被称作“西番”的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四川境内的被称为藏族，而在云南境内的则被称为普米族。事实上，四川境内的这部分藏族所说的语言不同于藏语而同于云南的普米语，而普米语又接近于羌语和嘉绒语。从这里向西，越澜沧江到怒江，有现在已承认是单一民族的怒族，但是怒族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一部分和其西的独龙族相通，都接近于其南的景颇语。景颇语和羌语现在是被认为与彝语平行的藏缅语族中的两个语支。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从怒江西岸越过独龙河和其间的山脉就是居住着需要识别的察隅的僜人。

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

.....

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瑜。上面提出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和这里所说的“僜人”，可能就是在这走廊中在历史

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族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余留。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

二、《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2]

潘(光旦)先生的设想指出了我们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却有它总的趋势。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总的说来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内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这一盘棋如果看清楚了,我们现在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就容易说明了。

.....

再说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西陲的这个走廊。历史上彝族属系的不同集团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它们正处在汉藏之间。这几个大民族在这地区你来我去,我去你来地搞了几千年。来回的历史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冲积的沉砂。所以,我在前年(范按:指1979年。费老记忆有误,应为1978年。)曾经指出过,这是一个极值得研究的地区。但是我们对彝族至今还没有个全面的认识。一谈到彝族就是凉山奴隶制。要知道这只是彝族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历史的残余部分。实际上彝族的各部分发展很不平衡,许多部分早已超过奴隶制阶段了。现在已经认定的云南地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我想不少是和彝族极为密切的。为什么分成这些民族也要进一步研究。

我这样说是为了要指出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后似乎要进一步和宏观的研究配合起来。最近听说西南几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攻关,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是很好的。我希望云贵高原也不妨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一次综合调查。我们现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的调查,其实是另一个地区,即南岭山脉这个走廊的综合调查的起点。

.....

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